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Study on Language Policies of U.S.A

李英姿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李英姿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 李英姿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310-04347-7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美国 IV. ①H3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704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2.375 印张 2 插页 171 千字

定价:2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重视隐性语言政策研究

——序李英姿《美国语言政策研究》

1982年，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为了推动“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实验（简称“注·提”实验），首先从黑龙江省佳木斯、拜泉、讷河的3所学校开始，之后推及全国28个省（市、区），有数百万名学生参与，并且对海外华语教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英姿就是通过“注·提”实验启蒙的。英姿才思敏捷，文笔清新，她的散文（特别是博文）常记述一些有趣的事，具有一种鲜活的美。30年之“注·提”实验，尝试不停，争论不停。英姿的敏捷才思和清新文笔，并不能成为评判“注·提”实验成败得失之充分证据，但却是很意义的成功个案。其实，“注·提”实验进行了30年，参与学生数以百万计，是应当对这一教学实验作个全面的总结了。

当然，英姿后来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跟她当初参与“注·提”实验就不一定有必然性的联系了。但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的语言政策，确实与她在夏威夷大学的留学生活相关。2006年，国家设立专门的留学基金项目，支持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英姿深受国家之惠，也感谢李英哲先生惯有的慷慨，同意与我一起联合指导英姿读博，因而成就了英姿的一段留美生涯，为她研修语言规划理论、了解美国语言政策、搜集研究资料、广结学术善缘，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英姿耐心地查阅了美国的法律、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英文文献，对殖民时期以来的美国语言政策进行了历史梳理，并从移民语言、土著居民语言、外语、英语的境内外推广等方面，清晰地描写了美国语言政策的全貌。

英姿发现,美国不仅是文化的大熔炉,也是语言的大熔炉。众多的移民语言都被溶解了,只有英语成了美国最权威的通用语言,发挥着“国语”应有的一切功能。但是有趣的是,联邦政府并没有维护英语、同化移民语言的明文规定,甚至宪法中也没有规定英语的特殊地位,虽然有人不断提议将英语的国语地位写入宪法。但是这并不能说美国没有语言政策,美国对语言生活的治理是通过隐性的方式进行的,是隐性语言政策在发生作用。

英姿关于美国语言政策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将语言政策划分为显性语言政策与隐性语言政策的重要性。所谓显性语言政策,是指通过法律条文和政府文件等明文规定的语言政策,世界上多数国家当今都有自己的显性语言政策。所谓隐性语言政策,是指通过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活动等体现出来的语言倾向,以及可能影响到语言生活的其他法律条文或政府文件。隐性语言政策虽不是关于语言生活的明文规定,但是能够起到语言政策的作用。

显性语言政策与隐性语言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来说,显性语言政策是隐性语言政策的“法规化”,其基础是隐性语言政策。显性语言政策在执行中仍然需要隐性语言政策的襄助,甚至需要再转化为各种隐性的语言政策,从而进一步引导隐性语言政策向着显性语言政策的方向凝聚和发展。有些国家没有显性语言政策,如果也没有一致的、足够有力的隐性语言政策,这个国家的语言生活将是“碎片化的”。没有显性语言政策的国家,如果其隐性语言政策强大且一致,这个国家的语言生活仍然会十分有序;如果其隐性语言政策中具有不合国际共识的东西,反倒有助于政府掩饰其非,或者为政策调整留下操作空间。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甚至是非法制的国家,显性语言政策如果得不到隐性语言政策的支持,则只能是一个口号、一只花瓶或是一个梦想,并不能真正发挥什么作用。

由此来看,无论是学术上还是语言规划的实践中,都必须重视对隐性语言政策的研究。其实,当前已经有一些关于隐性语言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如“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语言声望的研究与规划、语言认同问题的探索、语言的文化意义的阐释、语言能力的经济价值的揭示,等等。但

是这些研究还不全面、不深入，没有形成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在社会语言规划方面，还不自觉、不系统，缺乏理论的指导。隐性语言政策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

我国具有语言规划的悠久历史。古代中国虽然也有过显性语言政策，如秦代的“书同文”、唐代的“字样之学”、清代的“国语骑射”等，但总体上看采用的多是隐性语言政策。自从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之后，中国语言政策开始由以隐性为主向以显性为主转变。自此之后百余年来，中国制定了大量关于语言的法律、政府文件、规范标准等。这对于从旧时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跨越是适应的。但是，在普通话推广达到全国总人口70%的今天，在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矛盾进程中，中国应当更善于利用隐性语言政策来实现语言规划。

“注·提”实验虽然是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但也可以看作是一项隐性语言政策的实施。从隐性语言政策的角度研究“注·提”实验，总结“注·提”实验，当有另一番学术风景。

李宇明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2012年12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发展及概念范畴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9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11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	13
第二章 英语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语言政策	15
第一节 英语优势地位的最早取得	16
第二节 美国官方语言在法律上的缺失和事实上的存在	19
第三节 美国单语主义的传统	23
第四节 英语的规范和保护	26
第五节 美国语言政策的分类	29
小 结	34
第三章 从语言灭绝到语言保护——对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政策	35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宗教和英语的双赢	36
第二节 美国建国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同化	41
第三节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挽救政策	45
小 结	51
第四章 始终如一的同化——针对移民的语言政策	53
第一节 殖民时期至 19 世纪 80 年代：无为而治	56
第二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之交：语言限制主义	59
第三节 “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双语教育的蓬勃发展	69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唯英语运动	80
小 结	90
第五章 从忽视到重视——美国的外语政策	92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外语教育的萌芽	92
第二节 建国后现代外语教育的初创和初步发展	94
第三节 “二战”后至 20 世纪末：外语发展的里程碑	97
第四节 21 世纪：立足于国家安全的外语政策	107
小 结	115
第六章 美国的英语国际推广政策	118
第一节 语言国际推广的原因和方式	119
第二节 欧洲国家对外推广本国语言的举措	128
第三节 美国的英语国际推广政策	133
小 节	146
第七章 结 语	149
参考文献	158
后 记	18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发展及概念范畴

语言规划和政策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实践活动,其存在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从世界范围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曾大力推行古拉丁语的研究和使用,试图通过净化拉丁语的手段来维护其神权统治,还有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复兴,在我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书同文”政策,中国近百年来的包括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国语运动以及建国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等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可以说都属于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的实践活动。但是语言规划和政策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新学科的历史还很短暂。20 世纪 90 年代,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 21 世纪的一个新命题,它几乎影响到每个国家的所有领域。在语言领域,全球化加剧了各个国家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大大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和理解。在全球化视野下,语言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日益巨大,语言规划和政策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谈及语言政策,总是跟教育以及解决沟通问题等方面相联系。语言政策通常与政治或者经济关系密切,而不仅仅和语言、文化相关。近些年来,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愈发引起相关领域学者们的注意,各个国家政府和相关机

构也开始重视本国语言政策问题,积极探索制定并施行新形势下有利于本国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的语言政策。

1.1.1 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发展历程回顾

据 Spolsky (2004: 11) 考证,第一本包含“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字样的著作出现在 1945 年,该书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外最先提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的学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 Uriel Weinreich, 1957 年他在一次研讨会上使用了这个词汇。随着相关研究的增多,“语言规划”作为一个使用较为广泛的学术术语在学界逐渐确定下来。Haugen (1959: 8) 在一篇讨论挪威语言标准化问题的研究论文中把“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使用,他理解的语言规划是在一个非单语社会中为作家和演讲者提供指导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等进行规范的活动。后来,他也承认他列举的内容实际上是语言规划者执行语言政策之后形成的产物或结果。

一般认为语言规划可以区分为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是决定语言或变体地位和功能的决策过程,也就是什么样的语言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包括官方语言是什么语言,非官方语言是什么语言,通用语言是什么语言,什么场合下可以使用什么语言,创制、改革文字等。本体规划指的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方面,包括词典的编纂、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及文字规范,等等。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地位规划所选择的语言也是本体规划的对象。同时,本体规划所涉及的对象有可能影响地位规划所作出的决定。例如,有的语言缺少技术词汇,如果地位规划涉及技术词汇问题,那么这种语言在地位规划方面的前景可能就不大乐观。反过来说,对一个缺乏适当地位规划的语言进行本体规划也只能是技术上的游戏而已。除了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语言规划后来又增加了另外一类别:学习规划或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学习规划指的是经由语言学习增加语言使用的人数。学校的语言教育规划是学习规划的一种。语言的

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是最为常见并广为接受的分类方式。

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都有着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从世界范围看，语言规划和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南美、亚洲的很多老牌殖民地纷纷走向解体，新兴国家不断独立，比如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非洲的喀麦隆、坦桑尼亚和刚果等。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量移民涌入西方发达国家，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复杂格局。语言问题伴随着民族问题逐渐凸显，由移民语言地位和语言教育等因素引发的新情况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伴随着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国语及官方语言的选择和推广问题逐渐提到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各社会群体或族群都希望自己的语言被选中成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有时甚至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面对这种情况，各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些纷争进行调解或作出反应。语言规划或语言工程正是妥善处理这些语言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美国的 Joshua Fishman、Charles A. Ferguson，还有其他一些先行者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语言问题，并帮助他们发展语法、建立书写系统、为土著语言编写词典等。有着西方描写语言学训练背景的语言学家们热衷于收集整理分析那些从来没有被记录和从未被研究的陌生语言的数据，这些田野工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代语言结构和应用的相关理论，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纵深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语言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除了在理论上丰富和扩展了语言研究的范围，社会语言学家的很多研究成果也对新国家建立和民族统一起到了指导作用。在这些新独立国家采用哪一种语言作为通用语言，选择殖民语言还是土著语言，往往取决于哪种语言更易于推广，或者哪种语言更能得益于西方技术和经济的支持。有一种比较一致的观点，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语言学家看来，他们认为主要的欧洲语言，一般是英语或者法语，应该被用来当作正式或者在专门领域所使用的语言，而殖民地当地的土著语言则应该用来行使其

他功能 (Ricento, 2000: 198)。伴随着这样的讨论, 1966 年在美国召开了发展中国家语言问题大会。1968 年, Fishman、Ferguson 和 Das Gupta 编辑了《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一书, 该书是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领域最早的著作之一。Fishman (1968: 11) 把对发展中国家语言的研究看作是“社会语言学家不可缺少的, 并能真正引发田野工作的新发展”, 这样有益的实践对语言规划中本体规划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美国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的语言学家们引领了第一代研究, 并且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可以说, 在语言规划学科诞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语言规划被看作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学家帮助新兴国家解决语言问题的一门学科。

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了一段静止时期。在这段时间里, 学者们对语言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兴趣。受批评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 还因为当时在许多国家中语言规划运动的实践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一些语言政策专家开始质疑该领域早期研究业已形成的一些基本假设的正确性。比如, 在新独立国家的语言规划活动中, 语言学在其中的作用到底应该如何体现, 对此一些学者批评某些语言学家不是客观地记录语言或者提供忠实于社会语言事实的中立描写, 而是帮助这些新独立国家创造了某些语言 (Crowley, 1990)。还有如“双言”(diglossia) 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被批评为“社会语言学安排的思想意识上的驯化”(Woolard and Schieffelin, 1994: 69), 并把这种意识渗透到了语言学和不平等社会中来。在多种语言接触的复杂环境中, 一些本来被广为接受的概念, 比如语言学理论中主流的“母语者”、“母语”、“语言能力”等概念表现出的不充分甚至无能为力遭受到质疑, 这些术语甚至因此被很多学者弃用。这个时期, 批评者们认为语言规划研究者所采用的语言学理论是不中立的、不客观的, 因此是一种伪科学的工具, 以至于在多语环境下不利于平等的语言政策发展。一些人认为当时很多国家的语言政策实质上是为了迎合多数和主流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了少数和非主流群体的利益。由此很多人开始对语言政策领域的研究理想产生幻灭感, 于是语言规划和政策的

研究在饱受非议的情况下停滞了一段时间。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从这个时候开始,伴随着英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其他一些语言也在积极向外传播,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些语言面临着濒危和消亡境况。语言领域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刺激着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的研究迫切拓展原来的研究范围和重点。继 Haugen 之后,从 Cooper (1989) 和 Ager (2001) 开始,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研究者众多,新著不断涌现,研究成果丰硕,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堪称是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Hormberger, 2006: 24),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批评和后现代理论的发展也找到了通往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的新途径。这些因素都激发了研究者们以新的角度和立足点来审视这个崭新的领域。各个国家也开始纷纷重视本国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从 20 世纪末到现在,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Ricento (2000) 将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阶段根据如上特征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是有道理的。

1.1.2 语言规划和政策关系的处理

在众多语言规划概念中,其中有一个比较中肯:“语言规划是指根据语言获得、结构或者功能分配采取主动措施从而影响(人的)行为的活动。”(Cooper, 1989: 45) 这个概念有足够的弹性包括了政府官方语言规划机构,也包括了作家、出版商等有能力影响语言行为的人在内。语言规划可以被看作是“领导者试图改变社会的工具”。(Weinstein, 1983: 37) 语言政策是语言接触和冲突的产物,往往出于解决语言矛盾的需要,通常当某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在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群体中遭受到其他语言干扰和威胁的时候出现。语言规划和政策经常被描述为以试图解决语言问题为目标,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试图规划语言的行为往往是语言问题产生的源头,尤其是当它损害少数人的语言权利以及危及社会、教育、经济、政治利益的时候。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字样经常同时出现, Fishman (1972) 主张区分语言规划和政策,他认为语言政策制定后语言规划的过程才会发生。Fettes (1997:

14) 认为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关系如下:

语言规划……必须和语言政策评估联系起来:前者提供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后者为了推动其发展得更好,来检验在实际操作中的想法……语言规划模型。这样的领域最好描述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简称 LPP)”。

Cooper (1989) 列举了在字面上与“语言规划”很接近的概念,包括“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语言政治”(glotto politics)、“语言规范”(language regulation)、“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等。他引用一系列文献试图证明这个术语的受欢迎程度,比如《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通讯》(*Language Planning Newsletter*),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文集等。因为“语言规划”在以上术语中是最受欢迎的,所以他选择这个术语。他坚持认为“语言政策”这个术语“多数时候指语言规划的目标”,而不是方式,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列举更多例子(Cooper, 1989: 29)。

Cooper (1989: 30-45) 专门设计了一个框架来说明语言规划,即“Who plans what for whom and how?”“Who”指参与语言规划中的人,不过他认为这些人忽略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What”指一系列活动。Cooper 认为语言规划的另外一个分类是语言教学,他把这一类称为“习得规划”。参与习得规划的包括教育层级的教育家和一线教学的教师。还有一类是语言问题的解决,就像 Haugen (1972: 52) 指出的:“在语言问题出现的时候就需要语言规划。如果语言环境不令人满意,就有实施语言规划的空间。”Cooper 认为语言问题并不一定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学范围,语言问题的解决不是与地区、民族相独立的,而是直接与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文化、宗教等相关。语言规划也不总是从上至下的,从下至上的语言规划也可能发生。比如在美国 19 世纪 70 年代英语使用中去除性别歧视的实践。这场运动完全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直到后来才被政府所采纳,然后官方出具了专门的语言使用指导。

冯志伟(1999: 91)认为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另外也有很多学者倾向于减小或者忽略二者之间的区别。Spolsky(2004: 8)认为语言政策包括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国家整体的所有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相关管理决策。蔡永良(2003: 176)认为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某种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陈章太(2005: 148)也认为语言政策等同于语言规划或者计划(language planning)。他认为,语言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宏观方面,如确定并推广国家的官方标准语言和民族共同语、标准语,制定或改革文字,以及对共同语、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推行等;微观方面,如对共同语、标准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的正字法和正词法等确定规范标准,对推行共同语、标准语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大致对应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

实际的情况是,语言规划和政策的指称区别是有用的,但是这样的区别解决不了语言规划和政策之间关系到底如何的问题,而且目前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定确实缺乏一致的看法。规划属于政策还是政策属于规划?政策是规划的结果?不尽然。规划能产生其预期的政策?也不一定。目前的文献也没有对二者进行非常详细和严格区分的研究,所以很多语言学家更倾向于采用中性的术语“语言政策”来指称和语言相关的国家政府行为以及有能力影响语言的私人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这些分歧和模糊界限,语言规划和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旨在追寻政策和规划关系复杂理解的一个统一的概念(Nancy, 2006: 25),而实际上也确实很难严格界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不管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区分与否,或如何进行区分,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基于此理解,本书将二者之间的界限进行模糊化处理。

1.1.3 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

一般认为,官方语言政策可以通过官方准则的强制执行来影响语言行为,从而促进或者阻碍民族语言的发展。现实的情况是不仅存在那些重要的、显而易见的、明文规定的官方语言政策,而且也有不属于政府部门的行为却同样可以对语言行为施加影响,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区分官方/显性(explicit)、隐性/模糊(implicit)的语言政策(Weinstein, 1979, 1983; Schiffman, 1996; Wiley, 1996a, 2000)。所谓显性政策是指政府法令以及条例规则等明文规定的政策;隐性政策则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叫“语言文化”(Schiffman, 1996)。Schiffman认为美国的语言政策发挥威力的部分正是在于微妙的隐性政策,也就是语言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大部分对于流行的语言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官方的或者显性的方面。但是,隐性政策的标准和效果,可能对语言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可以形成和控制语言行为(Hass, 1992),这往往比官方的语言政策更有力量,更容易取得预期目标(Spolsky, 2004: 8)。Spolsky(2004: 39)指出语言政策可以在不由权威机构发布或者明确制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事实上,即使有一种正式的书面的语言政策,白纸黑字的政策也不一定被贯彻实施,或者说实施的效果不一定得到保证和始终如一。说语言政策可能是隐性的,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不同意,他们会认为这也是一种真正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社会群体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明确的和可以观察到的官方在语言管理方面的努力;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很多国家和机构并没有正式发布的书面语言政策,但是社会对公众对于适宜的语言或者行为却往往有明确的观点,而且不规律的和不连续的情况发生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语言政策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李宇明, 2007b),不成文的语言政策来自社会的语言实践(practice)或者语言信仰(belief)。有研究者认为民族语言,比如美国的英语,基本是在没有通过全国范围思想意识上的统一官方立法就被推动发展了。

本书所指的语言政策既包含显性的官方语言政策，也包含隐性的对语言实际使用产生影响的非官方政策。在研究语言政策的时候，忽视二者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得到不全面的和有偏见的观点。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从历史上看，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存在了，而语言规划和政策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人类历史上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过去的十年，也就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时代见证了语言政策新阶段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时候研究的新浪潮从早期集中在语言和发展的关系层面，扩大到关注语言政策在建立和维持社会经济平等过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所起到的作用上。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在当今社会显得日益重要，各个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政策。美国作为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领域的发端国之一，其语言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一直都是引人注目的。美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在美国成为一个国家之前，甚至是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在为后世的语言规划和政策起到了引导作用。可以说美国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对整个语言规划和政策这一学术领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英语对整个世界的影晌非同一般。而英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美国围绕英语制定的语言政策对当今英语地位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立足于英语出发点的线索贯穿了美国建国前后语言政策的始终，由此也引发了方方面面的讨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对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建国之初，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的交际语言，也就是通用语，是培养